

# 语言研究的一些思考\*

——罗仁地教授与戴庆厦教授对谈记

杨晓燕 罗仁地 戴庆厦 潘露莉

时间：2023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国际交流中心

主访者：罗仁地（Randy J. LaPolla）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级研究员，澳洲人文院院士，中央民族大学第一位长江学者）

提问者：戴庆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汉藏语学报》主编）

参加者：潘露莉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菲律宾中正学院前任校长，菲律宾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

记录、整理者：杨晓燕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戴：我与仁地先生是同行，都是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又是老朋友、好朋友。一见面总想听听仁地先生对语言研究的新见解，所以想趁这次在珠海开会的机会，找你交谈一下。

罗：谢谢戴老师。我很喜欢跟戴老师交流。戴老师给我提了 5 个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是想了解我这 10 年来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主要做了哪些。

在语言学研究上，我是做了一些，这是我的兴趣，写了一些文章。我主张放弃结构主义。因为我认为结构主义有不少问题，尤其是它的预设<sup>①</sup>，比如认为语言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一种共时的系统，所有的成分之间都有相互依靠的关系，可是连结构主义者到最后也认为这些是行不通的。因为语言是人的行为，不是逻辑系统，和我们其他的行为其实是一样的，它是经常变化的。我们认为语言一直在变，没办法找到所谓共时的系统，因为语言是一种活的行为习惯。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基本上是所谓的积木概念，找到最小成分来分析。其实语言不是这样的，语言是比较大的成分，不像一个语素似的。我在网上建了一个微信群，是构式语法的读书交流群，已有 280 多的群友参加，我们就在群里讨论这些问题，有时我们也精读一些经典的书。

除此之外，我还讨论汉藏语的系属，就是做比较科学的系属分类法。这是有争论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另一个就是在类型学上，我讨论了所谓的主位，就是布拉格学派的 Theme

\* 本文系罗仁地教授与戴庆厦教授二位先生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17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参加“何为田野与田野何为”工作坊会议期间的对谈记录，特予整理，以供研习参考。

① 可参看罗仁地《非结构主义语言学》，《实验语言学》2023 年第 3 期：1—6。

(主位), 主位和非主位结构。我认为主位是很重要的, 而且与很多人的理解不一样的是认为主位不一定包括主题, 更不能说主位就是主题,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说要区分主题和主位, 因为不是所有的语言会把主题放在句子前面, 还举了菲律宾的他加禄语 (Tagalog; 属于南岛语系) 例子。我受到他加禄语的启发, 这种语言的主题主要是在句子最后面而不是在前面, 有的学者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事实的确如此, 所以我认为这是类型学应该注意的现象<sup>①</sup>。

戴: 我想听听你对主位的认识。

罗: 研究一种语言, 要看主位上放的是什么信息。汉语把主题放在主位, 可是英语主位不一定是主题。英语的系统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如果听话者听到句子里第一个词是名词的话, 就是陈述句, 而且交代了陈述句的主题, 还有其他一些如助动词、动词、疑问词等作主位的时候都会标记不同的句型类型, 让听话者马上知道是什么样的交际, 而且要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系统, 是韩礼德 (MAK Halliday) 分析出来的。但他加禄语就不一样, 因为它的结构相反, 是谓语 (和焦点) 在前, 主题在后, 所以谓语在句子开头更重要, 因为谓语中不但有谓词说明主要的动作是什么, 而且它还能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告知主题在句子中的角色, 听话者会明白主题与动作之间的关系, 这很微妙。另一种是还有一些所谓的第二位置的附着词 (second-position clitics), 能够帮助听话者了解说话者的信息, 包括是否是疑问句, 还包括一些表示态度的成分等。有时候代词也出现在第二位置, 这也是很奇妙的系统, 与英文的系统很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

还有一个与类型学有关的。2016年有很多类型学家在网上讨论范畴化, 各自都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不要太抽象化, 要根据描写的语言事实。所以我的题目是《论范畴化: 要尊重语言的事实》(LaPolla Randy J., 2016), 认为要按照语言的真实面貌来分析。有一些类型学家认为可以把一些现象抽象化, 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范畴。但我认为那样会忽略语言的多元性, 就像现在常用的 *converb*, 这个概念合并分词、动名词和动词不定式为一个概念, 但这三个原来就是不同名物化的句子成分。很多人不知道这三个范畴各自的功能, 因为原来是按照功能分析的, 不是按照形式分析的, 而很多类型学家就是看形式。我主张不能只看形式, 要看形式背后的功能, 所以我在2017年写了一篇文章, 后来在 *Linguistic Typology* 期刊发表 (LaPolla, Randy J., 2017)。我认为做语言学不但要看形式, 还要看形式为什么是那样。这是语言学家韩礼德最优秀的一方面。

除此以外, 我在2018年编写了一套四册的有关汉藏语语言学的书 (LaPolla, Randy J., 2018), 我搜集了20世纪有影响的一些文章, 但现在很难找到这些文章, 因为它们是早期的, 但我觉得很有价值。每一册书的第一篇都是我写的导论, 介绍该册里的文章及其重要性, 然后讨论其后的语言学理论发展。刚开始学汉藏语的学者如果看这些内容就可以了解我们汉藏语语言学的发展。

---

① 可参看, LaPolla, Randy J. 2019. Arguments for seeing Theme-Rheme and Topic-Comment as separate functional structures. In J. R. Martin, G. Figueiredo & Y. Doran (eds.), *Systemic Functional Language Description: Making Meaning Matter*, 162-186.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戴：仁地先生，你一直关注汉语和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希望你能再给我们说说近期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罗：近期的进展首先就是我才谈到的那一套四册的描写汉藏语的书。第一册讨论的是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第二册是 language contact（语言接触）就是语言接触和区域现象；第三册是汉语方面的，讨论从高本汉开始的汉语分析；第四册收录了讨论藏缅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早期文章。这套书在英国 Routledge 出版。

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我在 2001 年写了有关民族迁徙和语言接触对汉藏语历史发展影响的著作。我一直注意迁徙历史这个问题。我认为不管要了解一个语言还是一个语系的历史，一定要了解其说话者的历史，而对历史的影响主要是迁徙。中国的历史就是迁徙的历史，是大规模的迁徙。如果不了解这些大规模的迁徙，就根本没办法了解汉藏语系的历史。

我最近在研究柯蔚南（W. South Coblin）的观点，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柯蔚南是李方桂的学生，但他有自己构拟的方法。柯蔚南原来是跟罗杰瑞（Jerry Norman）合作的，主张分析汉语方言最好不要按照传统的以《切韵》为基础的分析方案，在调查的时候也不要汉语字表来做（Norman, J. & W. S. Coblin, 1995）。这个观点我刚才在会上讨论过。高本汉有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认为《切韵》是一个语言，是一个地方、一个时间的语言。但实际上它根本不是。如果我们看《切韵》序，就会知道序中说得清清楚楚，是不同地方、不同时间读书传统的综合，就是文人写诗、读书时想了解某字应该怎么念，怎么押韵。《切韵》就是一部韵书，不是描写一种语言的书，它收集的是不同读书传统，因此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不是一个自然语言的系统。高本汉却认为《切韵》是一种活的语言，是一个系统，代表中古音。但后人用汉语字表调查方言，其目的很不一样，就是想了解方言与《切韵》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方言，而且要了解方言的历史发展，这个方法不能告诉我们很多有用的信息。其实如果你了解民族迁徙史，就能获得新的认识。我也写了一些有关闽语形成的论文（LaPolla, Randy J., 2022），认为如果了解迁徙的历史，就会知道闽地区是比较晚才有汉人去的，之前即使到了那边也没有融入到中国内地文人的社会圈子。闽语基本上是公元后 300 到 400 年之间形成的，是比较晚形成的，而且是从三条不同的迁徙路线形成的，这些路线上的语言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完全合并为一种语言。因此我们构拟的原始共同语，还有很多词不是同一种形式，要构拟两种形式。比如沿海的和西边的不一样，因为西边的是从浙江西部下来的，还有从江西迁徙过来的，他们合并在一起了。但沿海的那部分是从温州下来的，西边的和沿海的慢慢开始合并，但还没有完全合并。因而很多所谓的“闽”现象只有沿海有，并不是共同的现象，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戴：第二个问题是，藏缅语研究近 20 年来有什么新进展，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动向，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有哪些更新？

罗：藏缅语研究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就是以前我们能去做调查的地方很有限，比如过去根本没办法到印度东北部调查，然而那儿又有很多不同语支的语言。但这 20 年来我们这方面的资料大量增加，现在很多人都在印度东北部做调查，在中国也在做调查。如法国的一些学者还有日本东京外语大学的学者也在做。这是很好的现象。我在 2003 年和杜冠明（Graham

Thurgood)编写了《汉藏语概论》(Thurgood, Graham & Randy J. LaPolla, 2003),后来因为出现了这么多新的资料,我们认为一定要出第二版(2017),需要增加很多语言的描写。

怎样从理论上认识藏缅语,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如有的人认为藏缅语(还有汉藏语)所有的语言原来有很多形态,但后来消失了;有的人认为藏缅语(汉藏语)原来没有那么多形态,但在一些语言里一直在发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法国的向柏霖是做嘉戎语的,他认为嘉戎语是最原始的语言,因为它的形态句法是比较复杂的。我最近在泰国参加汉藏语会议,看到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也在做,但他们不怎么在乎这些问题,认为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就像李方桂先生说的,我们各方面都了解以后,回答就会很简单。所以我还是不怎么在乎他们怎么说,我在等更好的证据。

关于藏缅语发展的第二个新进展就是现在有幸不但可以了解更多的语言,还可以了解得到更多有关这些语言的其他信息。一些年轻人懂得科技,可以用更多的、更先进的一些方法,这是很好的一个发展方面。

戴:第三个问题请你评估一下当前汉藏语的研究状况,应该怎样更好地发展汉藏语研究?

罗:一方面是我刚才说的新方法,就是不以韵书为基础对汉语进行调查。由于高本汉的方法的关系,汉藏语的研究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能构拟出可信的古汉语,没有办法,只能卡在这里。因为存在不同的构拟方法。如高本汉做的构拟是一条线,马提索夫也采用高本汉的,李方桂先生基本上是接受高本汉的,龚煌城先生也基本上接受李先生的。另一条线是白一平(William Baxter)和萨加尔(Laurent Sagart)做的构拟,也是按照《切韵》的系统,构拟的原始汉语主要是按照《切韵》的范畴。

我的做法跟柯蔚南一样,都是采用自然语料,不用字表。使用自然语料就要去调查那些方言的情况,再采用传统的历史比较法分析语言。柯蔚南写了两本非常好的书,一本是有关赣语的历史发展,一本是有关客家话的历史发展,另外还写了有关闽语的历史发展,可是还没成书。我刚才说的这些方言的历史都是迁徙影响所致。所以柯蔚南把方言里的不同词汇分成不同的层次,界定它是什么时候进入的,它的形式是什么迁徙影响的。我自己花了很多年学《切韵》的系统,跟着张琨、郭锡良、唐作藩都学了,所以我能了解,但现在认为用处不大。所以像柯蔚南的做法,我认为真的是告诉我们有关方言历史发展的可靠信息。其实在国外除了柯蔚南以外没有多少人做。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整个汉语有比较可靠的构拟,再与藏缅语比较就非常容易,但现在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没办法真正构拟出原始汉藏语的形式。

戴:柯蔚南的汉语史构拟能到上古吗?

罗:他最近没有做系统的汉藏语构拟研究,因为他还在做个别方言构拟研究。他构拟了原始赣语、原始客家话,还发现原始闽语不是一个系统,因为一个词往往可以构拟出两种形式,这是因为词汇还没有完全合并,是不同迁徙路线影响的。柯蔚南还没有构拟到上古,他使用自然语料,可能会有一点限制。其实除了柯蔚南外,新加坡的沈瑞清也在做闽语,成果非常多,还有一个日本学者叫Akitani Hiroyuki(秋谷裕幸),也是专门做闽语历史发展的,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就是重视自然语料和迁徙历史。这是使用自然语料的一个好处:从自然语料中,你会得出相同的看法,但不用自然语料,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戴：第四个问题是根据这几天的会议情况，你对田野调查有什么系统的认识？比如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特殊性，不同语言的共性和个性，自然语料如何处理，自然语料如何实现归纳法，如何结合母语人的认知特点，等等。

罗：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用翻译汉语字表来调查，然后又用翻译汉语句子，现在我认为那样调查没用。

我认为要尽量尊重发音人的认知范畴，不要把调查者工作语言的范畴硬套在目标语言上。比如调查英文的时候，看到 pumpkin，你记录“南瓜”，那看到 squash 你也记录“南瓜”，那就错了。你是按照汉语的范畴，没有按照英语的范畴来记录。如果你调查的就是“南瓜”，可能美国人会说 squash，但你又忽略了 pumpkin 是另外一种类似“南瓜”的范畴。所以我认为要尽量找出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这是从洪保特开始的，后来到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李方桂、迈瑞哈斯（Mary Haas），以及博厄斯和萨丕尔的其他学生，他们做调查时都要了解说话者的思维方式。我也属于这一派。马提索夫是迈瑞哈斯的学生，我是马提索夫的学生，黄成龙又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一条线。我们都持这种观点。这与结构主义不一样，因为结构主义重视结构，起码传统上的结构主义是这样的。我认为如果只研究结构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一定要调查这个词有怎样的用法。比如英文的“soup”和中文的“汤”，核心概念是不一样的，用法也不一样。调查者要了解它们的范畴，就是被调查者头脑中的范畴，这些都需要调查出来。又比如喝茶的时候可以讨论汤色，汤也是喝的，但在西方不能说“soup color”，而且 soup 是吃的，不是喝的。我最近看了相关的翻译，他们在讨论中国的茶道，提到“soup color”，我认为这种英文翻译欠妥。不能说“soup color”，因为 soup 类似汉语的“羹”，是很稠的，“soup”和“汤”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虽然翻译 soup 为“汤”，但二者的概念很不一样。我认为这是学语言最有意思的地方。要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对于双语人来说，不仅是增加知识，而且如果你能形成两种思维方式，你的思维方式就比较灵活。这是双语人的优势，因为一个语言的 habit 要压制另外一个语言的 habit，会使头脑变强，而且思维方式之间的转换，从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现象，都会使我们的头脑更加灵活。实际上有两种双语人，一种是学了两种思维方式，这是真正的双语人，还有一种是双语人会说两种语言，可他的思维方式只有一个，就是母语的，他掌握的第二语言就会受到母语思维方式的干扰。

戴：所以双语人有优势也有缺陷。

潘：就像汉语的“想你想断肠”，如果直译的话意义就不准确了。

罗：对，不能直译。其实每个词都不一样，比如“杯子”，英文分 cup、glass 和 mug，汉语的分法可能很不一样。

戴：所以做语言调查要做到这个层面，就实在了。

罗：我认为做语言调查其实所有的语言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当然如果语言的形态比较丰富的话，要多注意这方面，可是如果是分析型的语言，没有那么多形态，可能分析就比较容易，但是调查方式还是一样，应当尽量收集自然语料、长篇语料，不同语体的长篇语料，因为不同的语体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范畴、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构式。所有语言都可以这样做，要收集大量的语料。昨天开会我没有提到一个方法，是我在缅甸使用的比较有用的方法。即可以

在调查中同时搜集两种语体,一种语体是交谈对话语体 ( conversation ), 另一种是程序解释语体 ( procedural text )。如果是我自己调查的话,我就会问合作人,你怎么打猎,怎么做陷阱等,但实际上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因此我找一位中年人去访问他的前辈,比如他的父母。因为中年和年轻的日旺人已经开始不怎么懂得他们的传统文化,如果他去问他的父母,问爸爸按照他们的传统做法你们是怎么打猎的。这样做非常成功。因为同时有交谈,还有文化知识,还有怎么做事情的程序。这时老人就会详细地讲,要如何做,有哪些步骤。比如我在调查独龙语的时候,我问老太太怎么酿酒,她说的时候,不但是一个一个地讲不同的步骤,而且是成套的,形成一段一段的讲述。在她的讲述中,每段的每一句的动词是重叠的,没有别的形态,只有每段最后一句有完整的形态标志,表示那段结束了。而且在新的开头处,有时会有一个开头词 nu, 功能有点像汉语的“那”(转主题),就是开始新的一段,这蛮有趣的<sup>①</sup>。只有在那种程序讲述中会出现动词重叠。所以我认为要重视自然语料,而且是不同语体、不同方面的自然语料。

戴:自然语料如何实现归纳法?

罗: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比如有很多语料,如何抽离出常常重复的一些结构。如那个结构和这个结构一样,而跟另外的结构又不一样,成了一个个单位。因此你要看它呈现的是什么,我们称之为 pattern,就是一种模式,但我认为很难翻译成中文,就是常常出现的“形式”或“规律”。比如一个句式、词组结构什么情况下可能是反复出现的。我们需要找出这些,看它的语境是什么,有怎样的意义,每次出现的功能是否一样,其实功能和意义是一样的。这样根据语料慢慢作归纳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分析是很可靠的,可以给别人参考,其他人也可以证明你做的是对的,因为依靠的是自然语料;另一个是你只要分析语料里出现的现象,就不必讨论所谓的“这个语言是怎样的”,只能说“我的语料中呈现的现象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只谈语料中呈现的现象,不管语料里没出现的现象。这也是狄克森 (RMW Dixon) 和 A.Y. Aikhenvald 的做法。

戴:在调查中如何结合母语人的认知特点?

罗:我知道在国内以前常常找母语人描写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国外一般不这样做,都是非母语人分析,如果是母语人的话,在一些方面有优势,因为他已经知道某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也听过有关的传统故事。比如郑武曦,她就做得非常好,采用羌语自然语料,在国外发表了好几篇文章<sup>②</sup>,母语者也应该这么做。

---

① 可参看 LaPolla, Randy J. 2001. *Dulong texts: Seven fully analyzed narrative and procedural tex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2: 1-39.

② 比如 Zheng, Wuxi 2022 *The final particle ue in Longxi Qiang: A marker of realis and stanc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89: 17-36.

Zheng, Wuxi 2021. *Stance-taking in Longxi Qiang: Metaphor of the third person possessive pronoun tseɪ. Journal of Pragmatics*, 177: 65-81.

Zheng, Wuxi 2020 *The first person singular pronoun topic as attention-getter in interaction: A study of qá mà in Longxi Qia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156: 1-15.

Zheng, Wuxi 2019 *Polyfunctionism derived from fillers: The case of lámò in Longxi Qia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139: 79-96.

潘：就是说母语者在做母语研究时，会犯以上这些错误。但如果受过第二语言的影响，或者像我们受过普通话的影响，对某个语言现象的理解，应该会更客观。

罗：正如中国的一句话“旁观者清”。我的学生，一般来说我不让他们做自己的母语，因为他们不会学到完整的做法。我认为参考语法是训练学生最好的方法，因为要照顾到语言的各个方面，如语音、形态、句法、会话等都要涉及，这是最好的训练。如果是母语者，就不会有如此完整的训练。

潘：调查者会根据自己的固有思维。不会说汉语的人来研究汉语，能够发现许多汉语母语者常常忽略的东西。

罗：所以调查者最好研究比较陌生的语言，自己分析，就能学会那个方法。当然做完陌生的语言后，还可以回到自己的母语，用新眼光来看待母语，但还是要依靠自然语料，做母语也要用自然语料，不要以为你脑子里都可以想得出来，因为你分析自然语料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现象，可是那就是事实，人家就是这么说的。有的学者认为语料库会有错误的句子，不应该完全依赖自然语料的语料库。这不是科学的描写态度，是语言教学的规定性态度。语言不是这样的，因为语言一直在变，所谓的规则其实没有规则，都是人的行为。是习俗、习惯，包括个人习惯、社会习俗等，没有所谓的错句。我常常告诉学生，要相信自然语料，因为语言是你最好的老师，如果你相信那个语料是对的，你可以向它学很多。我们经验主义者认为语言是已经说出来的话，可是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脑子里能产生的句子，是还没说出来的话，这两个立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戴：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传统语言学 and 现代语言学的关系？

罗：一般来说，在西方我们说传统语言学就是结构主义之前的语言学，后来 20 世纪初开始有结构主义，包括早期布龙菲尔德 (Bloomfield) 的极端经验主义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极端唯理主义的结构主义，现在我们主张所谓的认知语言学，可是这包括很多不同的做法，包括“基于语用”的做法 (usage-based approach)。“基于语用”的做法完全靠自然语料，因为研究的是语言形式的用法怎么会影响其形式和意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比如语法化和音变现象都跟用法和频率有关系。比如英语的 going to V (去做某事) 在某一些构式里可以变成 gonna V (将行体)。这是因为用的很多，变成可预测到的，因此不必说得很完整。比如语调，汉语的声调、语调和西方的不一样。我最近在类型学讨论网上与一些语法化的专家探讨，我跟他们说，其实他们讨论的语法化现象是基于语用的现象。我认为语法化还应该包括语言的形成。汉语的语法化和西方语言的语法化看起来好像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根本没有语法化或只有比较少的语法化。但我认为一个句型的习俗化也是语法化，它是变成语法系统的一种成分，所以它就是语法化。但是它又没有经过语音的变化，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那不是语法化。但我认为所有的语言构式来自语法化。我认为实际上是两回事，一是它变成语法系统里的成分，一是说它使用的比较多，有些因为语调的影响可能会变成不同的形式，有的可以合并。形态标志可以变成一种范式 (paradigm)，但汉语就没有形成 paradigm，所谓的 paradigm 就是一套相关意义的形态标志都出现在同一个位置里，但不能同时出现，像印欧语系的格标志。所以我认为汉语虽然和英语很不一样，但也是一个语法系统，只是它与西

方语言的语法化过程不一样,可还是属于语法化。

潘:你今天早上开会时是不是跟戴老师在解释语言学的发展?

罗:是的。语言学的发展有不同的派别。一般来说,讨论科学发展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词,就是 paradigm,就是一个思想框架。比如最早对宇宙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到牛顿是另一套,到爱因斯坦又是另外一套。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是会变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化。语言学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洪堡特做得非常好,就是所谓的罗曼蒂派的罗曼蒂克是比较大的运动,罗曼蒂克主要的核心概念是要了解民族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格林兄弟,他们搜集了不同地区的德语传统故事,后来编写了《格林的童话集》(Grimm's Fairy Tales)。成书后,很多小孩子都能看到那些传统故事,编写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故事探究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们搜集完语料后,就开始比较,不仅比较意义,还比较形式,后来就演变为“新语法学语言学学派”(neogrammarian school of linguistics)。主要侧重历史演变,因此就开始分析德国不同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分析出语音演变规则,然后开始构拟原始语言。这就是有时你从某个目的开始,但后来就发展为另一个目的,就像后来的新语法学语言学学派,包括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原来是新语法学派的学者,受了某些影响,就开始研究结构主义,后来成为了结构主义的核心人物。

科学的发展历史都是这样的,很多人原来是一个思想框架,后来发展出另外一个思想框架。2017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讨论从20世纪到21世纪语言学的发展(罗仁地,2017)。我的看法是,我们目前在走向认知方面,是科学的经验主义。

戴:第五个问题是您多次谈到语言研究中的认知范畴,你为什么如此强调认知范畴,结合认知范畴进行语言研究要注意哪些问题?

罗:所谓的认知范畴,就是思维方式。说不同语言的人的认知范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敢问潘教师某个东西是什么颜色,因为我们的认知范畴不一样。我们进行语言学分析,是想要了解这些认知范畴。为此我以前在新加坡教一门课叫 How and why languages differ “语言是怎么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在课堂上我就用很多例子让学生了解,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范畴,语言的范畴反映认知范畴,我们需要看语言背后的认知范畴。

我们做语言学的时候,不单是研究语言的形式,还要了解形式背后的认知范畴。比如说德国语法化专家 Ben Haim。他有几本讨论语法化的书,主要讨论不同语言不同的语法化现象。比如比较结构,普通话是“我比你高”,广东话是“我高过你”,还有很多藏缅语族语言是“我在你之上”,他分析五种不同的比较结构所反映的概念,这些概念反映出对比较的不同思维方式。是思维方式影响句法形式。这样做研究很有用。

戴:的确认知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个比较大的题目。以前普遍认为是认知接近形式,你觉得有没有相反的情况?

罗:有。这是鸡和鸡蛋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是语法化结构的问题,是认知影响形式,这一观点形成以后,第二代在习得语言的时候也学得那些范畴。这方面有学者做过研究。曾经有个学者叫 Michon Bousquet,她就做了很多关于小孩习得不同语言的研究,她认为小孩刚出

生的时候,所有的认知范畴就像语音系统的认知范畴一样,可以发很多音,他们的脑子里没有固定的音位。但在慢慢习得母语的过程中,母语会逐渐影响他们脑子里的范畴。西方和韩国的语言研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小孩在习得母语的时候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sup>①</sup>,所以的确是鸡和鸡蛋的关系。

戴:仁地先生、露莉先生,今天谈得很好,涉及语言学许多重大问题。因为今天会议还有个欢送宴会,我们只能谈到这里。我想以后还有机会做进一步交流,期待再听到你们的新见解。谢谢!

#### 参考文献

- 罗仁地 2017 《尊重语言事实 提倡科学方法——21世纪语言学刍议》,《光明日报》2017.12.03。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7-12/03/nw.D110000gmrb\\_20171203\\_2-12.htm](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7-12/03/nw.D110000gmrb_20171203_2-12.htm)。
- LaPolla, Randy J. 2016 On categorization: Stick to the facts of the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20(2): 365-375.
- LaPolla, Randy J. 2017 *Causation as a Factor and Goal in Typological Comparisons*. *Linguistic Typology*, 21(3): 547-554.
- LaPolla, Randy J. 2018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4 Volumes: I.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s; II. Language Contact; III. Sinitic; IV. Tibeto-Burma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2022 *The Chinese Expansion and Language Coexistence in Modern China. Chapter 3 of Salikoko S. Mufwene & Anna María Escobar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Conta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23 *How Understanding Population Movements Influe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 Relationships and Language History: The Case of Min Chinese. Inspirations from a Lofty Mountai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90th Birthday*, 81-92.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23.
- Norman, J., and W. S. Coblin 1995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 (4): 576-584.
- Thurgood, Graham & Randy J. LaPolla 2003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Second expanded edition, 2017.

(杨晓燕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637009; 罗仁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  
研究中心 639798; 戴庆厦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100081;  
潘露莉 菲律宾北京大学校友会 4105)

---

① 比如 Bowerman, Melissa & Levinson, Stephen C. 2001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werman, Melissa 2018 *Ten Lectures on Language, Cognition,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eiden: Brill.